

揚州文史資料

第
四
輯

扬州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扬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



抗日战争时期的
爱国民主人士
韩国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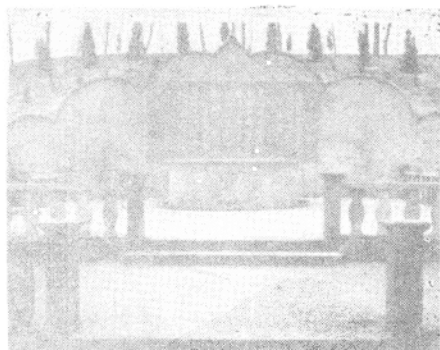
（汪庭弼供稿）

韩国钧墓

1982年韩国钧
逝世四十周年

海安县政府

重新修建



（杨一秋摄）



爱国教育家

李更生

(李崇淮供稿)

扬州文史资料第四辑目录

- 韩国钧爱国主义事略……………范崇山（1）
爱国民主人士韩紫石先生二三事……………陈明伦（17）

追求革新的爱国教育家李更生……………李公泽（21）
李更生校长踪迹略忆……………史文（28）
忆先师李更生先生……………张云谷（31）
八中校长李更生先生……………张震南（35）

五四运动中的盛成先生……………张德鑫（40）

镇扬汽车公司简史……………许建人 金治新（49）
瓜洲锅厂今昔谈……………黄旭东（65）
解放前仙女镇木业概况……………姜锦文（73）

回忆名宿张丹斧……………郑逸梅（81）
忆扬州教育家李琦先生……………陈汝衡（87）
毕生研制历史地图的江武子……………江淑芳（92）
瓜洲文献搜集和刊行者——于树滋……………顾一平（97）
李详先生传略……………任祖镛（101）
孙绍陶先生与广陵琴社……………王建白（109）

记“闲话扬州”风波……………李为扬（111）

我对苏北临时参政会的一点回忆……………康仲平（118）

关于抗日时期重庆各报“联合版”的追忆……………陈孝直（121）

我是怎样贿选为伪国大代表的……………崔锡麟（126）

昙花一现的淮南盐务局……………陈 沣（133）

中国社会党扬州支部始末

——《郭坚忍女士传》补遗……………陈 沣（138）

扬州小吃琐忆……………鲁 伯（141）

韩国钧爱国主义事略

范崇山

韩国钧，字紫石，又作止石、子石，晚号止叟，歿后私谥勤恪。清咸丰七年三月初四日（1857年3月29日）生于江苏泰县海安镇一个商人兼地主的家庭里。现子女均已病故，孙辈多居祖国台湾省。

韩国钧，清光绪年间举人，屡次赴京会试落第，依例应大挑，得一等为知县，先后任职行政、矿务、军事、外交，以忠君守职和勤敏，被保荐嘉奖，得慈禧太后召见和赞勉，清末，官至吉林省民政司。辛亥革命后又受袁世凯接见和赞赏，历任北洋政府江苏省民政长、安徽省巡按使、江苏省省长并一度兼督军。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退隐居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全国人民抗日斗争高潮的推动下，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奔走呼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磨擦，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战。最后，身陷敌手遭迫害，坚贞不屈，严词痛斥敌伪威逼利诱，拒绝出任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1月24日于忧愤中病逝。陈毅曾以诗文寄托哀思，高度赞扬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将其与宋、明诸贤相并论，

誉之为“民族抗战之楷模”。①

(一)

韩国钧任官从清末至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扬历仕途近四十年，在任时以“忠君”思想为主导，事事尽其心力，图“以先王之义胜富贵之荣”；②同时也有一些爱国精神，主要表现为：关心民众，谋图振兴和维护主权。

同情和关心民众。韩国钧生于清末，幼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家中店业开始衰落；童年，父母双亡，店业亏损、倒闭，“家贫不能自给”，依靠二姑母抚养，虽于孤寒中感奋苦读，二十二岁时才中举；青年时代，随中举房师，颠沛流离于如皋、甘泉、六合、金陵、昭文等县幕任教读十余年，“恃笔耕以糊口”。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处境，特别是在县幕中亲见词讼案件，使其“知民生疾苦至剧，慨然以救民为己任”。从任县官起，他注意考查地方利弊，慎重地审理民案，重调查，重证据，反复询问，认真推敲，尽量从速判准，争取一次判理结案，于镇平任知县，最多一天判结二十六起案件。他关心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在武涉县任时，组织群众翻沙出土，改良石田，一年增加熟地四万多亩；于河内县一次种植湖桑两万余株；任江苏民政长时，设立江南水利局、江北运河工程局，拨款七万元开浚秦淮河，又兴修白茆河。他同情民众疾苦，体恤江苏困难，以“江苏田赋之重甲于天下”，电请北洋军阀政府重新议订赋税制度，不再增加江苏赋税。任永城县取时，莅任即查察旱荒灾情，发放救济，至生病高热，仍不忘饥民；任奉天劝业道、交涉司时，为防治东三省鼠疫，在“心力交瘁”和生命“屢濒危险”中周旋，使病疫日退；任吉林民政司时，为长春

大火灾，呈请清政府贷款，抚循民众；任江苏民政长时，为抚赈南京兵灾，专设赈抚局，贷款商肆二十万元，请求北洋政府拨款一百八十万元救济市民；任江苏省省长时，为齐卢战祸，派红十字会分赴前线，以四十万元，赈济妇孺四千余人；战后，又拨发军署二十万元，抚赈伤兵二千多人。

谋图富强和振兴。韩国钧在县幕任教读时就曾读过上海制造局所翻译的西方新学各书，学过英语，了解到西方现代之科学。入官之后，研究过泰西政治，河南、河北矿务、交涉之任，使其“更知五洲中国之外，若英、美、德、法诸邦，无一不争先恐后，苟不自强，则必为所吞噬”。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内政渎乱，外侮侵寻，中日甲午战争后，接踵而来的是八国联军侵入津京，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韩国钧更感到奋慨无以自容，欲“以富强为法”，“亟思有以自力”；③虽年近半百，仍辞差赴日本考察农、工、商、学、矿各业，历时三月之久，并详细记载，编著出版了《九十日之实业界》，以期效法日本，振兴中国之参考。

外交维护主权。韩国钧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任职河北矿务局和交涉局时，为购地筑道清铁路，英国人秘密答应以购地每亩五角、合计四万元贿赂韩国钧，遭其当面斥责；接着，英国福公司狡猾地以原办矿合同中有怀庆“左右”和“专办”四字为借口，无理要求索取怀庆“左”边之彰德和“右”边之济源，企图强霸河北三府之矿，韩国钧以原约“怀庆”二字据理力争，并提出怀庆亦应允许人民开采，福公司几次电报英驻中国大使，要挟清政府外交部，他坚持正义，始终不动摇，经过三年交涉，终于使矿界愈缩愈小，而且开始有“民办”。东三省鼠疫流行时，沙俄借口防疫，阴谋夺我主权，要派兵围烧哈尔滨；日本以保护其侨民为词，

企图扩大侵略范围，欲派兵至关内检查，被韩国钧驳斥和抵制，日、俄阴谋未能得逞。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期间，中日矛盾加剧，韩国钧极为关注，该年前五个月日记中，记载中日关系者多达二十四处，深感“浪人起事”，“要求满蒙权利”，“愈逼愈紧”，“棘且危矣”，叹息我“国不自立”，“毫无抵抗之能力”。④

韩国钧退官归里后，专心作书，先后编纂了《海陵丛刻》（集宋、元、明、清十六家著述，共二十三种，六十七册）、《吴王张士诚载记》（共五卷）、《张吴纪事汇编》（正副本计六册）。关心实业，发起并筹资七十万元，以近海十六万亩土地，创办了泰源盐垦公司；创立了海安平民工厂，以其七十寿辰之寿仪八千元，购地一百三十亩，捐助该厂为永远基金；创建了紫石中学（今海安县中学）。热心水利，1926年山东黄河决口，在他努力要求下江苏省拨款二十万元，于山东省筑成“江苏堤”；193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特大洪水，里下河又倒灌，发生飓风、湖啸、运河大决堤，为修复运堤，他年过古稀，奔走大江南北，大年除夕不休息，途中两次倾跌，唇破齿落、血流满面不停止，共筹款三百五十多万元，修复决口二十六处（合计八百余丈）；1935年黄河再次于山东决口，他以个人名义发起劝募五千元，救济徐海一带灾民；又用心于瓜洲、六圩坍岸危险之防范，带病计议开浚海安焦港工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方才被迫停止。

韩国钧的爱国精神，当时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在任时有“韩一堂”、“韩青天”之颂声；⑤离任时有陈酒果、设香案，衷曲依依，垂泪相送者，卸篆安徽巡按使离皖返里时，出署门“焚香跪者满途，穷民顶香者不下两千余人，至大街，香案盈市，几乎无家不设。”⑥

(二)

“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韩国钧一直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从各地朋僚的来信中，他看到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经济枯竭，看到了民族危机的加剧，并为民族前途焦虑。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后，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韩国钧主张抵抗。在上海抗战中牺牲之烈士遗骸由沪运回居里，途经海安时，他商请地方各界人士特设公祭，表示哀忱，动员各界奋起抗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人给他送《救国公债委员会会议决案》时，他当即签字表示同意，当日又捐出一千元，支援抗日；他亲自写信给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鲁苏皖边游击司令官“二李”（李明扬、李长江）、税警总团陈泰运等，要求他们抗日。⑦

抗战之初，在我党积极倡议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韩国钧由于社会阶级地位的局限，不了解共产党，他认为国民党是有全国政权、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强者，寄抗日希望于国民党。但是，现实又很快地使他对其希望发生了动摇和怀疑，他看到日寇由上海向北侵犯南通、如皋、海安时，国民党韩德勤“省军无一抵抗”；继而蜂起的保安旅，“号称十旅，拥此多兵，未有联合攻日计划”；⑧他听到，国民党华北战场失利，华中又“连失苏州、南京及徐州、武汉”，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节节败退，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害。日机空袭海安，枪射炮击，一次死伤数人。日军侵占海安，韩国钧带着家人至远离家乡百余里之兴化坂坨避难。他在乡村的儿子、儿媳、五岁的小孙以及上学的孙女都

徒步数十里，奔走逃难，一家散落四方，他以大片国土沦亡和日寇侵略海安为自古未有之奇耻大辱，不禁怒问：“家在哪里？国在哪里？”他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但又找不到抗日的力量，对抗敌、对民族前途感到悲观，国民党要他搬家到淮阴、上海、重庆，他都拒绝了。

在韩国钧重新寻找抗日力量的时候，他连连听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抗日，屡战屡捷；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以及陈毅亲赴泰州与“二李”谈判、联合他们一致抗日等新闻消息，国共两党对比下，韩国钧感到“新四军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老打败仗，看样子支持不下去了”；“新四军不贪财，不讲情面，打了胜仗”，“新四军有希望”。1939年秋天，他亲笔书赠王瘦生一联：“忍看江河千里赤，微闻国论一时清”，⑩正是他由寄抗战希望于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寄抗战希望于共产党的思想写照。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从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抗战胜利中，他开始看到了抗日的力量，在日寇第一次退出海安时，他回到故宅便欣然命笔作诗，写下了“大哀自信心非死，小劫宁知卵尚完”，⑪表示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0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日寇改变了策略，集中力量进攻我党我军，加强对国民党利诱，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磨擦中心由华北南移，华中反共风云日紧，磨擦事件纷起。根据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以及江苏敌、伪、顽和我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陈毅提出联李（“二李”）、击敌、反韩（德勤）的具体策略方针，在坚持原则，抗击国民党顽

固派进攻的同时，加强了争取中间势力和上层人士的工作。

春天，陈毅从苏南派专人给韩国钧送信，要求他支持新四军抗敌。韩国钧当时对新四军虽还不了解，但已久闻新四军及陈毅抗战之威名，于是当即复函，表示极愿为抗日尽力，并手书一联赠陈毅，联语是：“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表示对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信任和拥护。陈毅随后复以一联，联语为：“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⑫赞扬韩国钧的爱国精神。

夏天，国民党顽固派以大军进逼我苏南新四军，为和平解决内争，共同抗日，我新四军转移江北；韩德勤、李守维又屡以大军阻击我军于江滨。韩国钧表现出矛盾和动摇，一方面，他从本身阶级利益出发，希望保全韩德勤的势力；另一方面，他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反对对新四军制造磨擦。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敌，他奔走斡旋于韩德勤和新四军之间，往返调解。韩德勤执意磨擦，挑拨李长江以十一个团之兵力进攻我抗敌后于郭村休整的新四军。韩国钧闻讯，连连给“二李”写信，制止内战。李长江不听劝告，结果败北。事后，韩国钧曾当面批评、责备“二李”，说明国家危亡、团结抗日之大义。

郭村自卫战，我军获胜后，于兵临泰州城下而不攻“二李”，在团结、抗战、反顽的口号下对“二李”重申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之初衷，并释放全部俘虏，还出郭村，归还部分枪枝，“二李”感激不已，出面谢罪，表示中立，在我军奔袭黄桥顽固派何克谦旅时，如约让路，并对天鸣枪，以掩饰韩德勤耳目。

新四军进据黄桥后，立即进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召开士绅会议，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揭露韩

德勤顽固派的反共本质。陈毅又致函韩国钧，反复阐明我军救国救民之宗旨，说明团结抗战之重要，揭露韩德勤等制造苏北磨擦之真相，要求韩国钧帮助“纾解内部纠纷”，展开抗日战局。韩国钧读之表示“无任钦佩”，又为实现“一致抗敌之宗旨，全力对外，不使内部磨擦”，^⑬出面调停。韩德勤坚持反共，大耍两面派，一面大谈精诚团结、互相谅解，派代表至黄桥签定国共两方以姜埕、曲塘、海安为界，互不侵犯，共同致力于抗日、肃奸，企图蒙蔽我军；一面以副司令官身份发出“极机密”级“歼灭新四军作战命令”，调集十二个团的兵力，于九月初违约南下，进攻我黄桥。我军坚持自卫，歼灭了进犯之韩德勤顽军。

韩顽军进攻黄桥被击退后，韩德勤又指使保安旅张少华据姜埕，在经济上实行粮食封锁，不准一颗一粒南运黄桥，至使我军无衣无食。陈毅再次致书韩国钧、李明扬，揭露韩德勤制造反共磨擦，引证“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的历史教训，说明团结抗日之大义，请求“具实调停”。^⑭韩国钧“闻之泪下”，又为力求合作、一致对外奔波呼吁。韩德勤、张少华坚持顽固，仍厉兵秣马，公开宣称南向而击，我军忍无可忍，一举解放姜埕。

新四军攻占姜埕后，马上又呼吁和谈，韩国钧极表赞同，并由他主持，九月中旬于海安召集各方面军事长官举行“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即“联合抗日座谈会”），韩德勤事先同意，至开会时拒派代表参加；韩国钧又与黄逸峰、朱履先以及泰兴、如皋、泰县等八县代表十五人，联合通电各方面军事长官，呼吁“停战息事，一致抗敌”，“扫荡敌气，收复失地”，“体恤民艰，改进政治”，提出五条具体建议。陈毅随时复函，表示“切实遵办”，并提出“对

方立即停止进攻，立即实现和平”；“立即召集苏北军事会议，共同分配抗敌任务”；“彻底整军，澄清吏治”，“增加抗战实力”；“省府以友党友军对待新四军同人”等四项补充意见，“以最大忍耐力争对内和平”。“二李”、陈泰运也复函分别表示“原则上极表赞同”和“全部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韩德勤拖延再三，迟迟不复。韩国钧看出韩德勤无谈判及团结抗日之诚意，又与陆小波、黄逸峰、朱履先、黄辟尘等联合苏北绅商学各界致重庆二电：一电致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黄炎培转重庆国民党诸要员及蒋介石，呈述韩德勤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扫荡敌气”和“排斥异己”、“虐待民众”、“烧杀拷打”、“抢掠村舍”、“强迫借款”等罪行，要求国民党重庆当局急电韩德勤停战息争，整顿军旅，改善省政，挽救危局；一电致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江恒源转重庆国民党诸要员及蒋介石，呈述苏北粮食紧张，韩德勤查封禁运粮食，以至各地米价大涨，要求重庆当局急电韩德勤改善统制粮食，保证内地流通，调节民食，以纾民困。在韩国钧的影响下，李明扬直接急电蒋介石，指出“苏北局势日非”原因是韩德勤措施“有失当之处”，要求“即派大员来苏坐镇，力求改善，挽救危局”。^⑮

韩国钧在抗战斗争中，为“朱毛（朱德、毛泽东）于晋北一带多所助力”^⑯而感动，在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开始了解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才能还我河山，实现孙中山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之中国。他以八十高龄在野之身努力进行调停，有的朋友因其年事已高，以“勿多事”相劝告，韩国钧拒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年龄再大也不能当亡国奴，年事再高也要为团结抗日效力，抗战御侮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⑰

韩国钧和苏北士绅几十人继续于韩德勤和新四军之间进行调解。韩德勤继续坚持磨擦，9月下旬复电提出：“只要新四军退出姜埭，万事皆休，一切均可商议，否则无谈判之余地。”韩国钧看出这个要求太高，很难办到，只派代表将此电转告陈毅。为了团结抗战，陈毅立即于姜埭召开军民会议，公开宣布：新四军为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开展抗敌，决定自动撤防，撤出姜埭，规定三十日前撤完；严正要求：韩德勤改变政治态度，以友党友军对待新四军，召开和平会议，协商苏北抗敌问题；郑重声明：“如韩德勤必欲置我军我党于死地，只有出于自卫一途，即是说，我军退到黄桥决不再退。”^⑮各方代表大为感动，一致感愤陈词：“如果你们退出姜埭，省韩还来进攻，则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到苏北人民共弃。”^⑯

姜埭军民会议后，我军开始撤防，韩国钧和各方代表要求韩德勤和谈，但毫无结果。当我军从姜埭全部撤出时，韩德勤一面大骂从中调解的爱国民主士绅是“亲共分子”、“失意政客、军人”，“汉奸”，“敌探”；一面电称：“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才可进行谈判，否则，无商谈余地，”^⑰并密令其所部追剿我姜埭撤防之新四军，指使李守维调集大军进攻黄桥，各界代表闻讯，乃知被韩德勤愚弄，极为义愤，韩国钧随时打电话责问韩德勤，韩德勤诡称李守维不听其指挥。韩国钧见和谈无望，随即给陈毅写信，说明内战在即，要新四军作好迎战准备，信交新四军来人带回，一再嘱咐：“信要迅速转到，要直接交仲弘（陈毅）将军本人。”^⑱战争胜负的因素在于人心向背，韩德勤无心抗日，蓄意磨擦，不顾大局，拒绝和谈，使韩国钧看到其政治上的腐败，他预言：“韩德勤不是仲弘将军的对手，胜利是属于新

四军的。”^{②②}

10月初，韩德勤公然违背民意，调集二十六个团，两万大军，以其嫡系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为主力，疯狂向我黄桥发动进攻，我新四军七千健儿，在陈毅英明指挥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下浴血奋战，迅速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独立六旅中将旅长翁达于激战中负伤自杀，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在溃逃时落水毙命，韩德勤在惨败中率残部千余人逃窜兴化，黄桥战役在战略上取得了反磨擦的空前胜利，完成了挺进苏北的历史任务，使整个华中出现了抗战的新局面。

韩国钧原来常以其“未隶国民党，亦未入共产党，自问超然”^{②③}而自居自信，其实多倾向和相信国民党，这在黄桥战役前后有了变化：在黄桥战役前的和谈问题上，国民党韩德勤不顾民族抗战之大义，执意反共磨擦，诡计多端；共产党陈毅顾全抗战救国之大局，诚心合作抗敌，言行一致，使韩国钧从政治上，道义上看到国民党的腐朽，共产党的先进，在黄桥战役中，韩德勤顽固派以多败于少，以强败于弱；陈毅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又使韩国钧从军事实力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虚弱，共产党新四军力量的强大，促进他从相信国民党转变为相信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无论从政治道义上看，无论从军事实力上看，是先进的，是强者，他说过去他以为“袁世凯是私塾，国民党是学校”，这时他认为“国民党是私塾，共产党是学校。”^{②④}并断言：“朱毛非一般之人，中国将来得天下者必为朱毛。”^{②⑤}

在黄桥战役中和黄桥战役后，韩国钧发起苏北民众绅耆各界二百五十人两次致电蒋介石及重庆国民党各要员，揭露韩德勤“不愿御侮，只图内战”，“自毁实力，殃及民生”，以及“溃军经过烧杀掳掠，百余里糜烂不堪”，致使